

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借贷能有效提升 脱贫质量吗？*

王汉杰^{1,2} 温涛¹ 韩佳丽³

摘要：有效提升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脱贫质量是实现脱贫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基于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调查数据，本文以“聚类-粗糙集”方法构建了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脱贫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与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法实证考察了农户借贷对脱贫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正规借贷能显著提升深度贫困地区农户的脱贫质量，但这一作用具有群体异质性，即更有利于提升“精英农户”的脱贫质量，对于深度贫困户的作用并不显著；深度贫困地区农户非正规借贷不利于农户脱贫质量的提升，这一抑制作用集中表现在深度贫困群体当中。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快完善深度贫困地区信贷扶贫政策体系，切实提升农户脱贫质量。

关键词：深度贫困地区 正规借贷 非正规借贷 脱贫质量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在精准扶贫战略的有效牵引下，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王小林、冯贺霞，2020），《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显示我国贫困人口规模已由2012年的9899万人下降到2019年的551万人，这为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国的贫困主要集中在部分深度贫困地区，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需要长远全面的考虑，不能仅着眼于解决贫困人口的短期生存和收入问题，还应以突破贫困恶性循环为着眼点，加快培育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汪三贵、曾小溪，2018）。在2018年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打好脱贫攻坚战，必须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高质量的脱贫能够使深度贫困群体真正形成内生发展动力，防止脱贫人口再次返贫，这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农村金融市场‘精英俘获’困境破解与包容性成长研究”（项目编号：71773099）、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中国特色金融扶贫理论及机制创新研究”（中宣办发[2017]年47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创新团队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金融扶贫合作研究”（项目编号：SWU2009105）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本文通讯作者：温涛。

度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因此，如何有效提升深度贫困地区农户的脱贫质量是脱贫攻坚决胜阶段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国高度重视金融扶贫功能的发挥，在 2017 年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强金融资源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支持。以信贷支持贫困农户发展生产是我国现阶段金融扶贫的主要手段，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6 月，建档立卡户的信贷扶贫贷款余额已高达 2884 亿元。从理论上讲，信贷资源的注入有利于打破深度贫困地区的资本束缚，促进深度贫困群体自我发展。然而，随着贫困群体的不断分化，剩余深度贫困群体的致贫因素十分复杂，既包括个体层面的发展能力不足，也包括制度供给与区域发展障碍等因素。那么，在这一现实困境下，信贷资源的供给究竟能否有效提升农户的脱贫质量？

就农户借贷的减贫效应而言，已有文献主要聚焦于经济维度，对于农户脱贫质量的研究十分少见。绝大部分研究表明了农户借贷能够在经济层面上有效缓解农户的贫困状态（Khandker et al., 1998; Awojobi and Bein, 2011; Augsburg et al., 2015）。具体而言，信贷资源的供给能够扩大农业生产规模（何广文，2005）、提高家庭创业的可能性（张龙耀、张海宁，2013）、提升农业生产技术（Abate et al., 2016）、促进社区的发展（熊德平，2009），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从而摆脱贫困。同时，农户借贷也具备平滑消费的功能，贫困农户在欠收年份可通过借贷资金保障家庭福利水平，缓解经济困境（Berhane and Gardebrock, 2011; 王慧玲、孔荣，2019）。也有部分研究指出，信贷资金的供给未必能够有效改善深度贫困农户的贫困状态。这主要是由于信贷资金往往被相对富裕的贫困农户获取，深度贫困农户难以获得有效的信贷资金支持（Navajas, 2000; Lund and Saito-Jensen, 2013）。从我国农村发展的现实来看，“精英俘获”、“瞄准偏误”等问题广泛地存在于农贷资源的供给过程中。如温涛等（2016）发现“精英俘获”机制存在于农贷市场，这导致农贷市场功能错位、目标偏离；刘西川（2012）、胡联等（2015）的研究一致表明村级互助资金亦未能瞄准贫困群体，存在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尽管“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精英俘获”问题，但贫困地区仍面临“精英俘获”问题的严峻挑战（胡联、汪三贵，2017）。尤其对于极度贫困的家庭而言，正规借贷难以获得的情况仍未明显改善（尹志超等，2020）。

既有研究从经济层面（收入贫困、消费贫困）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农户借贷的减贫效应，这为本文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与逻辑起点。然而，关于农户借贷对农户脱贫质量的影响尚未引起充分重视，因此现有研究难以有效地服务于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脱贫质量提升政策的制定。同时，脱贫质量领域的研究亦尚处于起步阶段，既有的少量文献仅从理论上探讨了高质量脱贫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尚未提及如何定量评估农户的脱贫质量。鉴于此，本文有以下三方面贡献：一是基于能力贫困理论，构建农户脱贫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聚类-粗糙集”方法评价农户的脱贫质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二是从整体效应与分层差异的视角全面考察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借贷对农户脱贫质量的影响，这有助于厘清现阶段深度贫困地区信贷扶贫在不同农户群体间的作用差异；三是使用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调查数据，所得出的研究结论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深度贫困地区决胜脱贫攻坚目标政策的制定。

二、农户脱贫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农户脱贫质量评价指标

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质量术语标准中，质量是反映实体满足明确或隐含需要能力的特征和特征的总和^①，其核心是满足要求。因此，脱贫质量可定义为满足农户脱离贫困状态的需求，本文主要从物质需求、发展需求与权利需求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根据阿玛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贫困的根源在于可行能力的缺失，即能力的剥夺。基于这一理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牛津大学贫困和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开发了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主要从健康、教育以及生活水平三个维度来衡量个体的贫困状态（郭熙保、周强，2016）。但正如郭建宇、吴国宝（2012）的研究所指出，受到数据可获取性的制约，贫困人口所面临的社会权利剥夺在既有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中尚未得到充分考虑。为全面、科学地反映深度贫困地区农户的脱贫质量，本文将阿玛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客观发展现实，从农户的生活质量、发展质量、公共服务质量三个维度^②构建深度贫困地区农户的脱贫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生活质量维度反映了农户对基本生活条件的需求，基本生活条件需求的满足使其能够摆脱物质层面的贫困状态；发展质量维度反映了农户对自我发展能力的需求，自我发展能力需求的满足使其能够具备内生发展动力，实现自我“造血”功能；公共服务质量维度则反映了农户对社会享有权利的需求，社会权利需求的满足使其能够有效应对外部风险，如疾病、灾害等，从而降低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以上三个维度的指标层层递进，综合反映了深度贫困地区农户的物质需求、发展需求和权利需求，能够较为全面、科学地衡量农户的脱贫质量^③。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农户脱贫质量的评价指标

维度	指标	临界值
生活质量	饮用水	能使用干净的自来水或深井水，赋值为1
	电	家中能够使用电，赋值为1
	做饭燃料	能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电等清洁燃料做饭，赋值为1
	卫生设施	能使用室内、室外冲水厕所和干式卫生厕所，赋值为1
	耐用品	家中有彩电、洗衣机、冰箱、电脑、电话、手机、VCD或者卫星天线中的任何一种资产，赋值为1
发展质量	健康状况	家庭所有成员均未患有较为严重的疾病，赋值为1

^① 该定义来源于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 ISO8402—1994《质量术语》标准。

^② 在本文的脱贫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并未涵盖农户的收入，这主要是由于农户的收入所涵盖的信息量较多，即农户的脱贫质量与其收入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这将导致农户脱贫质量评价指标之间的信息重合度过高。

^③ 《2019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的数据显示，本文的评价指标体系中所涵盖的用水、用电、耐用品等指标在绝大部分贫困地区已基本实现覆盖，但深度贫困地区仍有17%的农户无法使用干净的饮用水，40%的农户无法使用干净的卫生设施等。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深度贫困地区，因此这一系列指标仍有保留的必要。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户的状况不断改善，在未来的研究中，可适当考虑剔除相关基础性指标，从而提升“脱贫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适用性。

	劳动力教育	家庭所有劳动力都完成小学义务教育，赋值为1
	儿童教育	家庭所有学龄儿童都在校学习，赋值为1
	政治参与	能够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赋值为1
公共服务质量	医疗保障	家庭所有成员均拥有医疗保险，赋值为1
	养老保障	家庭所有劳动力均拥有养老保险，赋值为1
	医疗服务	生病就医时方便 ^① ，赋值为1

(二) 指标权重评价方法

如何科学地确定农户脱贫质量指标的权重是本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已有研究表明，社会个体的福利指标之间往往表现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即难以用指标间线性组合的形式来反映社会个体的福利状态 (Nardo et al., 2008; 韩佳丽等, 2017)。因此，目前广泛采用的等权重法、主成分分析法等线性赋权法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基于现有指标权重评价方法的不足，本文将“聚类-粗糙集”方法运用到农户脱贫质量指标的权重评价当中。粗糙集 (Rough Set) 理论能够有效处理不完整、不确定性等各类不完备信息，从中发现隐含的知识，揭示其潜在规律。该理论的优势在于通过数据挖掘发现数据集合中的内部价值与规律，即不需提供处理数据集合之外的任何先验信息，仅需通过观测数据剔除冗余信息，并分析系统中各属性之间的依赖性与重要性，因而也成为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热点。

定义 1: 在粗糙集中, 可将信息系统定义为 $S = (U, C, D, V, f)$, 论域 U 为研究对象的有限集合, 即全体样本集; C, D 为属性的有限集合, 其中, C 为条件属性集, D 为决策属性集; V 是属性值的集合, 即属性 C, D 的取值集合; f 为信息函数, 该函数为 U 中的每一个对象赋予信息值, 即 $f(x_i, a) \in V_a, a \in A, x_i \in U$ 。

定义 2: 假设信息系统 $S = (U, C, D, V, f)$, R 为论域 U 上的一组等价关系, 且 $r \in R$, 若 $IND(R) = IND(R - \{r\})$ 成立, 则称 r 在 R 中是不必要的, 否则为必要的。若 R 中的每一个 r 均为必要的, 则称 R 是独立的。若论域 U 有两个等价关系 P 和 Q , 当 $Q \in P$, Q 是独立的, 且满足 $IND(Q) = IND(P)$, 则称 Q 是属性集 P 上的一个约简。

给定决策表 $DT = (U, C \cup D, V, f)$, $\forall B \in C$, 若属性 $a \in C$ 且 $a \notin B$, 则重要度公式为:

$$sig(a, B, D) = \gamma_{B \cup \{a\}}(D) - \gamma_B(D) = \frac{pos_{B \cup \{a\}}(D) - pos_B(D)}{|U|} \quad (1)$$

称 $sig(a, B, D)$ 为条件属性 a 对条件属性集 B 相对于决策属性 D 的重要度, 根据 (1) 式可计算出所有属性对应的重要度, 若 $sig(a, B, D) = 0$, 则意味着该指标的重要性极低, 应删除该指标。对于约简之后的指标 $A = (a_1, a_2, \dots, a_i)$, 计算各指标的重要度, 并对其做归一化处理, 最终得到各指标的权重:

^① “生病就医方便”指的是农户对就医便利性的主观评价。在五级量化表中, 若农户的选择为“非常不方便”以及“不方便”, 定义为“生病就医不方便”; 反之, 则为“生病就医方便”。

$$\omega_i = \frac{\text{sig}(a_i)}{\sum_1^i \text{sig}(a_i)} \quad (2)$$

本文以粗糙集理论为基础，结合聚类分析法对农户脱贫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筛选并评价各指标权重。首先，运用动态聚类方法将样本农户按脱贫质量状况进行分类，形成脱贫质量高与脱贫质量低两大类，以此作为粗糙集脱贫质量指标筛选的决策属性。其次，分别以农户脱贫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其聚类结果作为粗糙集系统的条件属性与决策属性，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约简，剔除冗余指标，从而得到最终的农户脱贫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最后，基于约简后的农户脱贫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粗糙集理论的重要度计算公式考察各属性在决策信息系统中的重要性，进而得到各指标的权重。

通过以上步骤，本文最终得出了农户脱贫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如表 2 所示）。可以发现，在运用粗糙集理论方法约简之后，并未发现冗余指标，即研究所选取的评价指标体系较为合理，能够科学地反映农户的脱贫质量状况。

表 2 农户脱贫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维度	指标	权重
生活质量	饮用水	0.0191
	电	0.0191
	做饭燃料	0.2702
	卫生设施	0.1532
	耐用品	0.0137
发展质量	健康状况	0.0588
	劳动力教育	0.1259
	儿童教育	0.0554
	政治参与	0.0609
公共服务质量	医疗保障	0.0349
	养老保障	0.1430
	医疗服务	0.0458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 2018 年深度贫困地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样本取自五个连片特困地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秦巴山区及六盘山区），这是由于我国绝大部分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以上区域。本文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保证样本的代表性：第一步，将深度贫困县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高到低排序，等距抽取 5 个县，五地区共 25 个县；第二步，将样本县的每个乡镇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序，分为两组，每一组中随机抽取一个乡镇；第三步，在每个乡镇中随机抽取两个村，

每村抽取 15 户农户。通过入户调查的方式，最终抽取了 1500 个样本，有效问卷的数量为 1363 份^①。

（二）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农户的脱贫质量。基于前文构建的农户脱贫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本文以加权求和的方法测度农户的脱贫质量。

核心解释变量：农户借贷。深度贫困地区农户的借贷资金来源于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两大途径。本文借鉴既有研究的主流做法识别农户的借贷途径：若农户的借贷来源为正规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或农村信用社），则识别为正规借贷；若借贷来源为非正规金融机构（如亲友或民间金融组织），则识别为非正规借贷。在此基础上，为控制农户家庭规模的差异，本文以人均正规借贷额与人均非正规借贷额分别衡量农户的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

控制变量。为有效控制其余因素对农户脱贫质量的影响，借鉴郭熙保、周强（2016）以及谭燕芝、张子豪（2017）等研究，本文选取了相应的控制变量，具体如表 3 所示。

表 3 变量的选取与度量

维度	名称	符号	变量说明及赋值
脱贫质量	农户脱贫质量	<i>Quality</i>	农户脱贫质量评价指标加权求和
农户借贷	正规借贷	<i>Formal</i>	家庭人均正规金融借贷额（元），对数化处理
	非正规借贷	<i>Informal</i>	家庭人均非正规金融借贷额（元），对数化处理
家庭特征	家庭总人口	<i>Pop</i>	家庭人口总数（人）
	户主性别	<i>Gender</i>	户主的性别（男=1，女=0）
	户主年龄	<i>Age</i>	户主年龄（岁）
	抚养负担	<i>Raise</i>	15 岁以下儿童及 65 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
	务工比例	<i>Nonfarm</i>	从事非农产业 ^② 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社会资本	县城亲友	<i>City</i>	是否有亲友 ^③ 在县城或城市生活（是=1，否=0）
	官员亲友	<i>Gov</i>	是否有亲友在政府部门任职（是=1，否=0）
	组织参与	<i>Org</i>	是否加入农业合作社（是=1，否=0）
区域环境	经济发展	<i>GDP</i>	2018 年县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对数化处理
	金融机构距离	<i>Dist</i>	1=非常不方便；2=不方便；3=一般；4=方便；5=非常方便
	村庄地形特征	<i>Geo</i>	1=平原；2=丘陵；3=山地

表 4 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在农户借贷行为方面，深度贫困地区农户的非正规借贷额明显高于正规借贷，农户更多地求助于非正规借贷渠道，可能是由于农贷市场的“精英俘获”问题所致。此外，抚养负担重、社会资本匮乏等是深度贫困地区农户的主要经济社会特征。

^① 除了剔除部分数据缺失的无效问卷之外，本文也剔除了家庭中无任何有效劳动力的农户样本，这主要是由于金融资源的增收效应取决于农户的有效生产过程，即本文的农户样本是具备一定增收能力的农户群体。

^② 在问卷调查过程中，主要通过询问农户的家庭成员是否外出务工来识别该成员是否从事非农产业。

^③ 亲友指代的是“农户的直系、旁系亲属以及来往较为密切的各类社会关系”。

表4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名称	定义	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脱贫质量	农户脱贫质量	<i>Quality</i>	0.585	0.229	0.020	1.000
农户借贷	正规借贷	<i>Formal</i>	1.272	3.011	0.000	11.000
	非正规借贷	<i>Informal</i>	4.084	4.170	0.000	11.510
家庭特征	家庭总人口	<i>Pop</i>	4.588	1.651	1.000	13.000
	户主性别	<i>Gender</i>	0.868	0.339	0.000	1.000
	户主年龄	<i>Age</i>	47.34	12.26	16.000	86.000
	抚养负担	<i>Raise</i>	0.364	0.271	0.000	1.000
	务工比例	<i>Nonfarm</i>	0.257	0.240	0.000	1.000
社会资本	县城亲友	<i>City</i>	0.331	0.471	0.000	1.000
	官员亲友	<i>Gov</i>	0.108	0.310	0.000	1.000
	组织参与	<i>Org</i>	0.082	0.275	0.000	1.000
区域环境	经济发展	<i>GDP</i>	9.561	0.208	9.386	10.690
	金融机构距离	<i>Dist</i>	2.972	0.977	1.000	5.000
	村庄地形特征	<i>Geo</i>	2.859	0.512	1.000	3.000

(三) 模型构建

本文的实证分析包含两个部分，即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借贷对脱贫质量影响的整体效应与分层差异。其中，整体效应以均值回归模型为基础；在分层差异中，由于均值回归无法反映整个条件分布，本文将采用分位数回归法，该方法能够研究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条件分位数之间的关系，适合分析农户借贷如何影响脱贫质量的条件分位数，其结果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农户借贷对农户脱贫质量影响的群体异质性。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农户借贷与农户脱贫质量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计量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将综合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①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法。

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P(Y \leq Q_{\tau}(D, X) | X, Z) = \tau \quad (3)$$

其中， Y 为被解释变量， D 为计量模型的内生解释变量， X 为外生变量， Z 为工具变量， τ 为条件分位数。遵循 Chernozhukov and Hansen (2008) 的做法，以线性形式将上式转换为矩阵形式：

$$Y = D'\alpha(U) + X'\beta(U) \quad (4)$$

其中， $D=f(X, Z, V)$ ， $U|_{x,z} \sim Uniform(0,1)$ ，这表明了内生解释变量 D 为外生解释变量 X 、工具变量 Z 和误差项 V 的函数。 U 表示其它不可观测变量，即其余不可观测变量通过 U 来影响 Y 。令最小目标函数为：

$$Q_n(\tau, \alpha, \beta, \gamma) = \frac{1}{n} \sum_{i=1}^n \rho_{\tau}(Y_i - D'_{i\alpha} - X'_{i\beta} - Z'_{i\gamma}) \quad (5)$$

其中， ρ 为 τ 分位点的检验函数。在给定分位点 τ 及其所对应的 $\alpha(\tau)$ 条件下，上述最小化目标

^① 由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模型形式较为常见，本文不再赘述。

函数即为：

$$[\hat{\beta}(\alpha, \tau), \hat{\gamma}(\alpha, \tau)] = \arg \min_{\beta, \gamma} Q_n(\tau, \alpha, \beta, \gamma) \quad (6)$$

通过上式可求得 $\alpha(\tau)$ 的估计值：

$$\hat{\alpha}(\tau) = \arg \inf[Wald_n(\alpha)] \quad (7)$$

其中， $\hat{A}(\alpha)$ 为 $\hat{\gamma}(\alpha, \tau)'$ 协方差矩阵的逆矩阵，运用迭代法使 $\hat{\gamma}(\alpha, \tau)'$ 趋近于 0，可求得 $\hat{\alpha}(\tau)$ ，并以 *Wald* 统计量进行检验，最终可得到 τ 分位点处 α 及 β 的估计值。

本文实证分析的计量模型如下所示（式 8）：

$$Quality = \beta_0 + \beta_1 Credit + \Theta T + \mu \quad (8)$$

其中，*Quality* 为农户的脱贫质量，*Credit* 为农户借贷行为（包含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T* 为控制变量（如表 3 所示）。同时，为避免异方差问题，实证过程中均使用稳健标准误。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总体效应

表 5 中（1）~（6）列为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借贷对脱贫质量影响的整体效应。（1）~（5）列的 OLS 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在未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农户正规借贷显著地提升了深度贫困地区农户的脱贫质量，而农户非正规借贷则降低了农户的脱贫质量。考虑到内生性问题^①，本文将农户所在县域的人均贷款额作为工具变量，进一步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6）列所示。从内生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Hausman 内生性检验结果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即存在内生性问题。考虑到在异方差条件下，Hausman 检验不再有效，本文也采用了 DWH 检验，结果表明 Durbin 与 Wu-Hausman 检验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由此可断定农户正规借贷变量是内生的。关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在一阶段估计结果中，工具变量的 t 值为 5.60，且一阶段估计的 F 值为 31.39，大于 10% 偏误水平下的临界值 16.38（Stock and Yogo, 2002），即检验结果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因此，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能够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列（6）作为最终实证分析结果。回归结果显示，深度贫困地区农户正规借贷显著地提升了农户脱贫质量，表明农户正规借贷能够有效地满足深度贫困地区农户的脱贫需求，改善农户的家庭福利状态，实现较高质量的脱贫，这有助于逐步打破深度贫困地区农户长期以来低水平均衡状态，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使其形成可持续的自我发展能力。而农户非正规借贷显著地降低了农户的脱贫质量，这意味着农户非正规借贷不利于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脱贫质量的改善，甚至使其陷入更深的“贫困陷阱”当中，其根本原因不仅在于深度贫困地区农户的发展能力有限，也在于现有农村非正规借贷市场的不完善、不规范。由此可见，如何实现深度贫困地区农村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

^① 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具有“嫌贫爱富”的本质，脱贫质量低的农户可能面临着更为严重的金融排斥现象，即脱贫质量与农户正规借贷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的协同互补，是实现高质量脱贫的关键所在。

表 5 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借贷与脱贫质量的整体效应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OLS	OLS	OLS	OLS	OLS	2SLS
农户借贷	<i>Formal</i>	0.007*** (0.002)		0.004* (0.002)		0.004** (0.002)	0.143*** (0.028)
	<i>Informal</i>		-0.015*** (0.001)		-0.011*** (0.001)	-0.011*** (0.001)	-0.016*** (0.003)
家庭特征	<i>Pop</i>			0.009** (0.004)	0.012*** (0.004)	0.011*** (0.004)	-0.008 (0.009)
	<i>Gender</i>			0.000 (0.017)	-0.005 (0.016)	-0.004 (0.016)	0.023 (0.037)
	<i>Age</i>			-0.002*** (0.000)	-0.002*** (0.000)	-0.002*** (0.000)	0.001 (0.001)
	<i>Raise</i>			0.016 (0.034)	0.009 (0.033)	0.014 (0.034)	0.168*** (0.058)
	<i>Nonfarm</i>			0.255*** (0.028)	0.232*** (0.028)	0.229*** (0.029)	0.147** (0.061)
	<i>City</i>			0.023* (0.013)	0.020 (0.013)	0.017 (0.013)	-0.061* (0.033)
	社会资本	<i>Gov</i>			-0.010 (0.019)	-0.016 (0.020)	-0.017 (0.019)
<i>Org</i>				0.082*** (0.023)	0.086*** (0.024)	0.086*** (0.024)	0.063 (0.058)
<i>GDP</i>				0.011 (0.030)	-0.016 (0.028)	-0.022 (0.028)	-0.231*** (0.078)
区域环境	<i>Geo</i>			-0.070*** (0.012)	-0.055*** (0.013)	-0.056*** (0.013)	-0.090*** (0.033)
	<i>Dist</i>			0.031*** (0.006)	0.035*** (0.006)	0.033*** (0.006)	-0.003 (0.015)
常数项	<i>Cons</i>	0.577*** (0.007)	0.646*** (0.009)	0.534* (0.277)	0.798*** (0.260)	0.861*** (0.263)	2.848*** (0.728)
样本量	<i>N</i>	1363	1363	1363	1363	1363	1363
内生性检验	<i>Hausman</i>						126.35***
	<i>Durbin</i>						129.25***
	<i>Wu – Hausman</i>						141.22***
	一阶段F值						31.39
	工具变量 <i>t</i> 值						5.60***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分层差异

在进行分层差异研究时，本文将采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法。为全面地反映不同脱贫质量农户的群体差异，本文选取具备代表性的五个分组：低脱贫质量组（IVQR_10）、中低脱贫质量组（IVQR_25）、中等脱贫质量组（IVQR_50）、中高脱贫质量组（IVQR_75）及高脱贫质量组（IVQR_90）。

表 6 中（1）~（5）列为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借贷对脱贫质量影响的分层差异。从结果可以看出，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借贷对农户脱贫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具体而言，除了 IVQR_10 分位点之外，深度贫困地区农户正规借贷在其余四个分位点上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农户正规借贷显著地提升了绝大部分农户的脱贫质量，但对于深度贫困户^①而言，作用尚不显著。从分层差异来看，随着分位点的不断上升，农户正规借贷的系数不断变大。这意味着尽管农户正规借贷整体上有效提升了深度贫困地区农户的脱贫质量，但脱贫质量的改善更多地体现在“精英农户”（IVQR_50、IVQR_75、IVQR_90）当中，弹性系数分别高达 0.270、0.340、0.371。而对于深度贫困户（IVQR_10、IVQR_25），则仅仅提升了中低脱贫质量组（IVQR_25）的脱贫质量，且系数明显低于高脱贫质量组（弹性系数仅为 0.089）。对于深度贫困户（IVQR_10）而言，农户正规借贷的脱贫质量提升效应并不显著。可见，“深度贫困户”的脱贫质量提升效应远低于“精英农户”，这可能是由于相比“精英农户”，“深度贫困户”各方面要素禀赋均处于贫困状态，发展生产的能力十分有限。在脱贫攻坚战役的推动下，部分深度贫困群体既获得了优惠性的正规借贷资源，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精准帮扶，这使得中低脱贫质量组的农户（IVQR_25）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自身的脱贫质量。但对于深度贫困户（IVQR_10）而言，由于长期处于贫穷状态，缺乏发展生产的能力，优惠性的农村正规借贷资源无法有效促进其发展，导致其可能面临着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问题。即便获取了农村正规借贷资源，能够通过发展生产实现还本付息的深度贫困户也必然只是少数。事实上，这部分深度贫困群体是脱贫攻坚决胜阶段的最大障碍，金融资源应更多地服务具备发展生产能力的贫困农户，而对于缺乏发展生产能力的深度贫困群体，应倾向依赖于社会保障兜底政策，并加强其子女后代的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王汉杰等，2019；汪德华等，2019）。

农户非正规借贷在各个分位点上的系数均为负，仅有深度贫困户（IVQR_10、IVQR_25）的作用显著。这意味着农户非正规借贷之所以降低了深度贫困地区农户整体的脱贫质量，主要是由于其显著地降低了深度贫困户（IVQR_10、IVQR_25）的脱贫质量。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囿于农贷市场的“精英俘获”问题，深度贫困户只能更多地求助于农村非正规借贷市场，而调研发现深度贫困地区非正规借贷资金的利率水平较高，当深度贫困户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收益率较低时，非正规借贷可能会恶化其家庭福利状况，不利于脱贫质量的提升。其次，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剩余贫困人口的主要特征，尤其是随着脱贫攻坚的不断推进，这一现象愈加凸显。全国 30 个省市、上百

^① 本文将脱贫质量低的两个分组（IVQR_10、IVQR_25）界定为深度贫困户。

个村的调查数据显示，部分贫困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分别高达 60%和 80%^①，这导致农户家庭缺乏有效劳动力，难以从事生产性活动。特别是当农户遭遇重大疾病时，高额的医疗费用使其难以负担。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贫困户所获得的非正规借贷资源更多地用于家庭成员的大病、慢性病的治疗，较高的非正规借贷利率加重了深度贫困户的经济负担，进而降低了脱贫质量。

需进一步指出的是，部分研究表明乡村精英可能在扶贫协作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朱天义、高莉娟，2016），这使得农贷资源的“精英俘获”可能未必不利于农户脱贫质量的提升。然而，乡村精英的治理绩效有赖于精英主体的素质、村民的自治制度、协调机制与信任关系等（梅继霞等，2019；陈秋红、粟后发，2019）。笔者的调研发现，囿于深度贫困群体边缘化、乡村精英的自利性以及贫困地区基层组织不完善等因素，乡村精英与深度贫困群体难以形成有效协作，深度贫困地区农贷资源“精英俘获”的正向溢出效应十分有限。因此，深度贫困地区脱贫质量的提升应充分重视农贷资源投入的精准性。

表 6 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借贷与脱贫质量的分层差异

解释变量		(1)	(2)	(3)	(4)	(5)
		IVQR_10	IVQR_25	IVQR_50	IVQR_75	IVQR_90
农户借贷	<i>Formal</i>	0.030 (0.019)	0.089*** (0.022)	0.270*** (0.052)	0.340*** (0.071)	0.371*** (0.098)
	<i>Informal</i>	-0.005* (0.003)	-0.014*** (0.003)	-0.006 (0.008)	-0.005 (0.011)	-0.005 (0.015)
	<i>Pop</i>	0.005 (0.007)	-0.001 (0.008)	0.005 (0.018)	0.002 (0.025)	0.006 (0.035)
家庭特征	<i>Gender</i>	-0.035 (0.031)	0.039 (0.036)	-0.003 (0.084)	0.014 (0.115)	0.002 (0.158)
	<i>Age</i>	-0.000 (0.001)	-0.000 (0.001)	-0.001 (0.002)	-0.001 (0.003)	-0.001 (0.005)
	<i>Raise</i>	0.027 (0.041)	0.113** (0.049)	0.052 (0.112)	0.118 (0.154)	0.042 (0.212)
社会资本	<i>Nonfarm</i>	0.096* (0.050)	0.021 (0.059)	0.106 (0.136)	0.189 (0.187)	0.100 (0.257)
	<i>City</i>	0.000 (0.025)	-0.051* (0.030)	-0.016 (0.068)	-0.002 (0.094)	-0.001 (0.129)
	<i>Gov</i>	-0.054 (0.036)	-0.002 (0.043)	0.001 (0.098)	0.004 (0.135)	-0.008 (0.186)
区域环境	<i>Org</i>	0.074 (0.049)	0.028 (0.057)	0.039 (0.132)	0.077 (0.181)	0.042 (0.249)
	<i>GDP</i>	-0.185*** (0.069)	-0.394*** (0.081)	-0.318* (0.186)	-0.230 (0.257)	-0.112 (0.353)

^① 数据来源：http://www.china.com.cn/news/2017-08/31/content_41507528.htm

常数项	<i>Geo</i>	-0.113*** (0.028)	-0.171*** (0.033)	-0.075 (0.075)	0.018 (0.103)	0.022 (0.142)
	<i>Dist</i>	0.026** (0.011)	0.010 (0.013)	0.014 (0.030)	0.013 (0.041)	0.010 (0.056)
	<i>Cons</i>	2.307*** (0.556)	4.549*** (0.655)	2.856* (1.506)	1.464 (2.071)	0.369 (2.848)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以熵值法计算农户脱贫质量评价指标的权重，重新对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具体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2SLS	IVQR_10	IVQR_25	IVQR_50	IVQR_75	IVQR_90
农户借贷	<i>Formal</i>	0.209** (0.105)	0.015 (0.011)	0.023*** (0.009)	0.120*** (0.023)	0.131*** (0.028)	0.014* (0.010)
	<i>Informal</i>	-0.022* (0.013)	-0.001 (0.002)	-0.005*** (0.001)	-0.004 (0.004)	-0.002 (0.004)	-0.003 (0.002)
控制变量	<i>Control</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i>N</i>	1363	1363	1363	1363	1363	1363

(四) 进一步讨论：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借贷的增收效应

在前文的分析中，本文主要从“脱贫质量”的视角分析了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借贷的减贫效应。为避免指标间信息重合度过高，评价指标体系中未涵盖农户收入。然而，现阶段深度贫困地区农户的收入增长依然是改善其贫困状态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借贷的增收效应。具体而言，本文以农户借贷为核心解释变量、家庭人均纯收入为被解释变量，运用 2SLS 与 IVQR 进行实证分析。表 8 的回归结果显示，深度贫困地区正规借贷的增收效应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农户当中，而非正规借贷对收入增长的抑制效应则表现在低收入农户中。这与前文的分析结论是相吻合的。

表 8 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借贷的增收效应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2SLS	IVQR_10	IVQR_25	IVQR_50	IVQR_75	IVQR_90
农户借贷	<i>Formal</i>	0.527*** (0.128)	0.190** (0.086)	0.356*** (0.100)	0.979*** (0.216)	1.063*** (0.256)	1.237*** (0.373)
	<i>Informal</i>	-0.056*** (0.013)	-0.019* (0.011)	-0.101*** (0.013)	-0.025 (0.029)	-0.011 (0.034)	-0.012 (0.050)
控制变量	<i>Control</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i>N</i>	1363	1363	1363	1363	1363	1363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扶贫不是一时的脱贫摘帽，而是要培育脱贫人口的可持续脱贫能力。因此，政府应注重脱贫质量的提升，促使脱贫效果由“量变”向“质变”转化，让深度贫困人口真正具备摆脱贫困的内生发展动力。基于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调查数据，本文以“聚类-粗糙集”方法构建了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脱贫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与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法研究了农户借贷对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脱贫质量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农户正规借贷能够显著提升深度贫困地区农户的脱贫质量，但这一作用具有群体异质性，即农户正规借贷更有利于提升“精英农户”的脱贫质量，但对于深度贫困户的作用并不显著；农户非正规借贷不利于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脱贫质量的提升，且这一抑制作用集中表现在深度贫困群体当中。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含义如下：第一，切实保障深度贫困地区信贷扶贫资源的精准落地。金融资源的逐利性与扶贫的社会公平性之间存在内在冲突，这导致了金融扶贫过程中“精英俘获”、“使命漂移”等现象。因此，政府应通过法律法规体系打击一切违法违规行为，确保信贷扶贫资源精准地服务于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从而为提升脱贫质量提供有效的资本供给。第二，深度贫困地区应实现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功能互补。对于部分发展能力较弱的深度贫困人口而言，通过商业性借贷发展生产提升脱贫质量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应更多地依托于政策性金融，在政府引导下逐步培育发展能力。第三，充分发挥深度贫困地区农村非正规借贷的减贫功能。农村非正规借贷内生于农村经济社会，具有天然的优势。但受制于发展体系不完善、监管机制缺位等问题，农村非正规借贷未能有效发挥减贫功能。因此，政府应加快农村金融法律的制定，使农村非正规借贷步入正轨，切实服务于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脱贫质量的提升。

参考文献

- 1.陈秋红、粟后发，2019：《贫困治理中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多重摩擦和调适——基于广西G村的案例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
- 2.郭建宇、吴国宝，2012：《基于不同指标及权重选择的多维贫困测量——以山西省贫困县为例》，《中国农村经济》第2期。
- 3.郭熙保、周强，2016：《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经济研究》第6期。
- 4.韩佳丽、王志章、王汉杰，2017：《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经济科学》第6期。
- 5.何广文，2005：《农户信贷、农村中小企业融资与农村金融市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6.胡联、汪三贵，2017：《我国建档立卡面临精英俘获的挑战吗？》，《管理世界》第1期。
- 7.胡联、汪三贵、王娜，2015：《贫困村互助资金存在精英俘获吗——基于5省30个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村的经验证据》，《经济学家》第9期。
- 8.刘西川，2012：《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的目标瞄准、还款机制及供给成本——以四川省小金县四个样本村为例》，《农业经济问题》第8期。

- 9.梅继霞、彭茜、李伟, 2019: 《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及条件——一个多案例分析》, 《农业经济问题》第8期。
- 10.谭燕芝、张子豪, 2017: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 《财经研究》第3期。
- 11.汪德华、邹杰、毛中根, 2019: 《“扶教育之贫”的增智和增收效应——对20世纪90年代“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的评估》, 《经济研究》第9期。
- 12.汪三贵、曾小溪, 2018: 《从区域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改革开放40年中国扶贫政策的演进及脱贫攻坚的难点和对策》, 《农业经济问题》第8期。
- 13.王汉杰、温涛、韩佳丽, 2019: 《贫困地区政府主导的农贷资源注入能够有效减贫吗? ——基于连片特困地区微观农户调查》, 《经济科学》第2期。
- 14.王慧玲、孔荣, 2019: 《正规借贷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了吗? ——基于PSM方法的实证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
- 15.王小林、冯贺霞, 2020: 《2020年后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标准: 国际经验与政策取向》, 《中国农村经济》第3期。
- 16.温涛、朱炯、王小华, 2016: 《中国农贷的“精英俘获”机制: 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分层比较》, 《经济研究》第2期。
- 17.熊德平, 2009: 《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8.尹志超、郭沛瑶、张琳琬, 2020: 《“为有源头活水来”: 精准扶贫对农户信贷的影响》, 《管理世界》第2期。
- 19.张龙耀、张海宁, 2013: 《金融约束与家庭创业——中国的城乡差异》, 《金融研究》第9期。
- 20.朱天义、高莉娟, 2016: 《精准扶贫中乡村治理精英对国家与社会的衔接研究——江西省XS县的实践分析》, 《社会主义研究》第5期。
- 21.Abate, G. T., Rashid, S., Borzaga, C., and Getnet, K., 2016, “Rural Finance an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doption in Ethiopia: Does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Lending Organizations Matter?”. *World Development*, 84: 235-253.
- 22.Augsburg, B., De Haas, R., Harmgart, H., and Meghir, C., 2015. “The Impacts of Microcredit: Evidence from Bosnia and Herzegovin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7(1): 183-203.
- 23.Awojobi, O., and Bein, M. A., 2011, “Microfinancing for Poverty Redu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ase for Nigeria”,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72): 159-168.
- 24.Berhane, G., and Gardebrock, C., 2011, “Does Microfinance Reduce Rural Poverty? Evidence Based on Household Panel Data from Northern Ethiopi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93(1): 43-55.
- 25.Chernozhukov, V., and Hansen, C., 2008, “Instrumental Variable Quantile Regression: A Robust Inference Approach”,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42(1), 379-398.
- 26.Khandker, S. R., Samad, H. A., and Khan, Z. H., 1998, “Income and Employment Effects of Micro-credit Programs: Village-level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5(2): 96-124.
- 27.Lund, J F., and Saito-Jensen, M., 2013, “Revisiting the Issue of Elite Capture of Participatory Initiatives”, *World Development*, 46: 104-112.
- 28.Nardo, M., Saisana, M., Saltelli, A., and Tarandola, S., 2008, “Handbook on Constructing Composite Indicators:

Methodology and User Guide”, *Oecd Stats Working Papers*, 73(2): 1111-1111.

29. Navajas, S., Schreiner, M., Meyer, R. L., Gonzalez-vega, C., and Rodriguez-meza, J., 2000, “Microcredit and the Poorest of the Poor: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Bolivia”, *World Development*, 28(2): 333-346.

30. Stock, J H., and Yogo, M., 2002, “Testing for Weak Instruments in Linear IV Regression”, *NBER Technical Working Papers*, 14(1): 80-108.

(作者单位: ¹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²哥廷根大学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系;
³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 胡 祎)

Can Rural Households' Lo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Areas of Extreme Poverty?

Wang Hanjie Wen Tao Han Jiali

Abstract: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deep poverty-stricken areas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rural households in areas of extreme poverty, this article uses a “cluster-rough set” method to construct a poverty alleviation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for rural households in areas of extreme poverty, and comprehensively uses a two-stage least squares method and a quantile regression method to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rural households' loan on the qua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mal loa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quality of farmers in areas of extreme poverty. However, this effect has group heterogeneity. Specifically, it is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of “elite farmer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for extremely impoverished households. Besides, informal loan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inhibitory effect is concentrated in the extremely impoverished group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credit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in areas of extreme poverty so a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farmers.

Key Words: Area of Extreme Poverty; Formal Loan; Informal Loan; Qua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